

文章编号: 2096-272X(2022)06-0007-08

高职专业群建设的政策演进、内在逻辑及改革对策^{*}

李存园, 岑洁玲^{*}, 雷志成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中山 528436)

摘 要: 专业群建设是影响我国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定程度上引领高职院校的改革发展的方向。我国专业群建设政策演进经历了形成期、发展期、提质期和深化期四个时期。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 专业群建设政策的时空逻辑、行动逻辑、牵引逻辑呈现出从适应到引领、从扩增到提质、从就业到发展的演化形态。面对新的发展形势和需求, 我国专业群建设政策应坚持注重体系结构优化与相关制度的创新, 注重专业群资源整合, 凸显聚集效应, 建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专业群育人模式, 以专业群内涵建设提升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等改革策略,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的高职教育发展道路。

关键词: 高等职业教育; 专业群建设; 历史制度主义; 政策

中图分类号: G712.3

文献标识码: A

专业群建设是当前我国高职院校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 也是推进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 增强职业教育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2006年“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计划”中, 专业群建设已成为改革的重要内容, 到2019年实施“双高计划”, 我国高职专业群建设经历了从“重点”到“特色”到“骨干”再到“高水平”的政策表达的演变。在此转变进程中, 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的内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专业群的发生逻辑、组群依据及推进策略等实践内容是否回应了这些变化, 以及如何回应这些变化? 基于此, 探究专业群建设政策变迁的历史进程以及专业群建设的逻辑, 既是对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的政策实践与理论命题的反思, 也是为职业教育类型化发展阶段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群发展提供发展和改革的参照。

一、政策变迁: 从重点专业群到高水平专业群

历史制度主义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 主要是通过追溯一段时期内历史事件发生的轨迹及其对现在的重要影响, 重视对关键政策节点的解读与分析^[1]。通过对专业群建设的政策演变及其内在逻辑的分析, 借鉴历史制度主义基本理论, 根据专业群建设政策演变的关键节点, 以分期的方式探寻其动态演变的轨迹。考虑到“专业群”最早在2006年教育部、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中被提出, 2006年也被称为专业群建设元年, 本文将十几年来我国高职专业群建设的相关政策演进, 划分为形成期、发展期、提质期及深化期四个主要阶段(见表1)。

收稿日期: 2022-05-06

^{*} 基金项目: 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双高计划’下高职院校专业群高质量发展机制构建与运行研究”(2019GXJK235); 2020年广东省教育科学青年创新人才项目“‘双高计划’下广东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群协同发展机制研究”(2020WQNCX207); 2021年广东省教育科研课题(高等教育专项)“高水平专业群建设与运行质量研究”(2021GXJK550)。

作者简介: 李存园,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职教研究所助教, 硕士, 研究方向: 职业教育管理; 雷志成,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职教研究所研究员, 硕士, 研究方向: 职业教育教学管理。

^{*} 通讯作者: 岑洁玲,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职教研究所讲师, 硕士, 研究方向: 高等职业教育。

表1 中国高职专业群建设政策演进的四个阶段

	形成期(2006—2010 年)	发展期(2011—2014 年)	提质期(2015—2018 年)	深化期(2019 年至今)
专业建设类型	重点专业(群)	特色专业(群)	骨干专业(群)	高水平专业(群)
计划建设数(个)	约 500	约 1000	约 3000	约 150
实际建设数(个)	440	969	3815	141

数据来源：教育部历年发布的相关政策文件。

(一) 以重点专业为标志的形成期(2006—2010 年)

为了落实《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2006 年 11 月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发布示范计划，提出重点建设 100 所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围绕国家重点产业领域，以重点建设专业为龙头，相关专业为支撑，形成 500 个左右重点建设专业群。同年，教育部还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强调“要根据市场需求与专业设置情况，建立以重点专业为龙头、相关专业为支撑的专业群”。两个政策文件的颁布实施，既拉开了长达十年的高职教育示范校建设序幕，也开启了以重点专业为核心的专业集群发展方式。到 2010 年，先后完成了第三批共 440 个重点专业群的试点建设。至此，以重点专业为龙头的专业群建设模式基本形成，并实质成为高职教育改革的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重点专业群建设是这一时期的鲜明特征，成为专业群建设形成期的标志。这一时期的突出贡献，不仅在于逐步明确了专业与专业群之间的关系，而且为专业到专业群的发展提供了基于“重点专业”的组群逻辑。

(二) 以特色专业为主导的发展期(2011—2014 年)

继 2010 年教育部、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要求各地支持特色院校和特色专业做优做强之后，2011 年 9 月教育部发布《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促进高等职业学校办出特色，全面提升高等职业教育质量，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将高等职业教育纳入本地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规划，支持特色学校和特色专业做优做强。同年，教育部、财政部决定联合实施“支持高等职业学校提升专业服务能力”项目，提出 2011—2012 年支持 1000 个左右高职专业进行重

点建设，要求坚持特色发展，主动面向重点产业和特色产业，充分发挥建设专业的引领辐射作用。最终，全国 969 所高等职业院校纳入该项目。至此，以特色专业为重点的专业群建设基本覆盖全国。2014 年 6 月，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 年)》出台，提出要“统筹职业教育区域发展布局，各地要提高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服务当地特色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引导区域内每一所职业院校都能集中力量办好当地经济需要的特色优势专业(集群)”。实际上，将特色专业建设推广至每一所高职院校，成为之后一段时期各地职业教育和各个高职院校发展的重要指南。经过示范计划阶段的推动，专业群建设寻求发展路径的特色化、差异化，并通过全国大范围试点，为下一阶段高职专业群建设的定位奠定了实践基础。这一阶段，特色专业成为引导专业群建设的发展方向，不仅逐步实现了专业群建设思路的改变，即由“专业优势”向“行业特色”转向，形成了特色专业为主导的专业组群逻辑，而且促进了专业群建设范式的进一步多元化。

(三) 以骨干专业为支撑的提质期(2015—2018 年)

2015 年 7 月，教育部发布《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 年)》，明确要坚持扶优扶强的基本原则，支持优质专科高等职业院校创新发展，职业院校骨干专业特色发展；支持紧贴产业发展、校企深度合作、社会认可度高的骨干专业建设，提升专业建设水平；开展优质校建设，鼓励支持地方建设一批专业特色鲜明的优质专科高等职业院校。2017 年 1 月，《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适应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完善职业学校布局结构，加强特色优势专业(集群)建设；面向重点领域，支持 100 所左右专业建设与产业融合发展的高水平职业学校。到 2018 年，全国共启动建设优质学校 456 所，骨干专业 3815

个，一批优质教育资源得以集中呈现。这一时期，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逐步深入，对优质高职教育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强，高职教育的社会需求适应度持续提升，优质校及其骨干专业群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发展支撑。专业群建设进入了迅速提质的发展阶段，表现出有效整合与提升“专业优势”与“行业特色”的显著特征。

（四）以高水平专业群为核心的深化期（2019 年至今）

2019 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开篇就强调指出职业教育的属性地位，开宗明义地从政策层面明确了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一种类型教育。同年，教育部、财政部发布《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明确提出“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职学校和专业群”。其中，优势特色专业，打造的高水平专业群是国家特色优质骨干专业群建设的进一步深化，是高职教育适应国际国内新形势，服务国家人才强国战略的有效回应。经过资格核准和材料评审，最终有 56 所高水平高职院校和 141 个高水平专业群入选，开始了首轮的建设周期。可以说，“双高计划”的实施是职业教育领域类似于普通本科教育“双一流”建设的国家重大教育政策。2020 年，《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更加明确地提出了类型特色突出、以质图强的发展要求，以及扎实推进“双高计划”的绩效考核与评价，遴选 300 所左右省域高水平高职院校和

600 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推进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至此，以高水平专业群为核心的专业群建设模式成为引领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从优质走向卓越的先行示范，是国家继重点专业群、特色专业群、骨干专业群，以及特色优势专业群建设之后，对专业群建设提出的更高层次要求。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实现了高职院校专业建设思路的转型，突出的变化在于专业群成为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新常态。建设一批中国特色、引领世界的高水平专业群成为高职教育专业建设的新目标。

二、内在逻辑：专业群建设的结构、路径、动力的有序转变

按照历史制度主义提供的宏观结构—中层制度—微观行动者的理论解释框架，可以将政策变迁的基本逻辑归纳为深层结构、路径依赖、动力机制三个方面^[2]。其中，深层结构主要从宏观层面分析影响制度变迁的因素，如从政治经济结构和文化心理结构等展开论述；路径依赖主要从中观层面分析制度发展的境遇，如从制度的设置成本、协同效应及适应效应等展开论述；动力机制主要从微观行动者的视角分析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力博弈，如从内部动力和外部动力等展开论述。联系到专业群建设的政策逻辑演化，就形成了影响专业群建设政策变迁的深层结构、政策演化的路径依赖、政策演化的动力机制三个部分（见图 1），且包涵着专业群建设政策的时空逻辑、行动逻辑、牵引逻辑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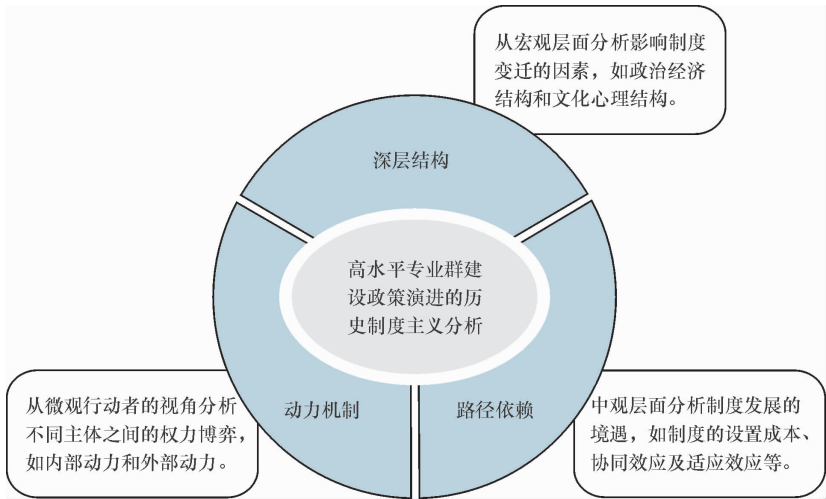


图 1 高水平专业群政策逻辑演进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

（一）时空逻辑：从适应到引领

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的深层结构核心在于对专业群的定位。从政策变迁现实来看，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群定位经历了从传统专业发展的“适应观”到“引领观”的转变。早期的政策安排多以“适应观”为主导。2006年“示范计划”建设提出“高等职业教育必须主动适应社会需求，形成500个产业覆盖广的重点建设专业群，提高示范院校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能力”。2010年《关于进一步推进“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提出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改革要主动适应区域产业结构升级需要，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2011年《关于支持高等职业学校提升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的通知》提出围绕“重点领域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支持一批紧贴产业发展需求、符合区域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需要的专业进行重点建设。”2015年《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提出“重点服务中国制造2025，主动适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需要，调整专业、培养人才”。而到2019年的“双高计划”，则提出“聚焦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重点支持一批优质高职学校和专业群率先发展，引领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融入区域发展、促进产业升级”。至此，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进入了“引领观”为主导的新阶段。应该说，从被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到主动紧贴经济和产业发展需求，从主动适应重点领域产业发展到聚焦高端产业并引领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的演变过程，是专业群发展定位的重大转变，是高职专业群与经济社会深层结构互动发展的重要体现。

当然，专业群建设定位的转变也需要与之配套的专业群发展范式的转型，尤其是在突出职业教育的类型教育属性和同等地位的发展阶段，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遵循引领国家战略发展的变革逻辑，需要从组群、资源整合、管理组织等方面把握政策变革规律^[3]。具体地讲，一是摆脱基于知识的学科印记，探索职教特色的组群方式。高职教育受到普通高等教育的长期影响，在专业组群上容易受到普通本专科教育专业设置逻辑的简单映射。高职专业群建设要从根本上摆脱学科联系为主的专业群建设方式，

就必须紧扣高职教育的高等性与职业性，综合分析产业、岗位、知识三种逻辑在高职专业群建设中的内在联系，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基本落脚点，结合新形势、新业态的复杂变化，探索符合高职教育类型特色的高水平专业群组群逻辑，为国家战略实施提供更优质的人才支持。二是摒弃拼盘式资源捆绑，优化专业群的资源整合方式。高水平专业群建设不是几个专业的简单捆绑，更不是若干专业资源的松散式拼盘。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核心要义是资源的整合与共享，要通过优质资源的解构与重组、加强与优化，发挥群组资源的外溢效应，形成示范和带动作用，提升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实践效果。三是变革传统的组织管理模式，建立立体化保障机制。当前，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的基层治理方式仍然以“系—教研室”的基本模式为主，即使进行了“以群建院”组织管理模式的变革，也缺乏与之相匹配的管理机制，群内专业各自为政，难以形成集聚效应。另外，缺乏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评价、反馈和保障机制，很难形成高水平专业群良性发展的保证机制。

（二）行动逻辑：从扩增到提质

专业群建设的行动逻辑是指专业群建设实践所遵循的规律和导向^[4]。其中，路径依赖就是行动逻辑的典型特征。从历史及实践演进看，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是从无到有的过程，每一次制度变迁都难以完全摆脱路径依赖的影响。一方面，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为专业群建设政策的连续性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专业群建设的政策创新。比如，重视专业群“数量”是历次专业群建设政策的典型特征之一。如在专业群建设政策经历的重点、特色、骨干和高水平四个时期之中，2006—2010年是重点专业建设时期，全国分3批共完成了440个重点专业建设；2011—2014年是特色专业建设时期，这一时期高职专业群建设突出行业特色、服务区域特色产业发展，全国共969所高职院校纳入特色专业建设行动计划中；2015—2018年是骨干专业建设时期，以优质校建设为契机，全国共启动建设优质学校456所，骨干专业3815个；2019年至今是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时期，全国56所高水平高职院校和141个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入选。可见，随着高水

平专业群建设政策的出台,被数量目标遮蔽的质量实质开始成为政策安排关注的焦点和重点。正因如此,2021年出台的《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绩效管理暂行办法》专门设计了《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数据采集表》,对“双高计划”进行绩效评价与考核,确保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成效。实际上,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从数量形态递增至递减的过程反映出专业群建设从规模扩增至质量优化的行动转变,是从量的追求到质的提升的现实要求,体现高职教育从扩增至提质的行动逻辑,从大众化扩张到内涵化发展的实践路径。

在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政策周期,通过理念与关键要素的改革以提升质量,实际成为专业群建设政策与实践的共识,内含着以提质为框架的行动逻辑。其一,“产教融合”的不断深化是切入点。产教融合是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核心要素,是高职教育实现类型特征,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由于产教融合深度不足、人才培养质量成效不佳,仍是当前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痛点和难点,因而,应以“产教融合”为切入点,创新融合模式,探索新型校企合作关系,促进形成政、校、企、研命运共同体,找到提高高职教育人才培养高端化的突破口。其二,“课程体系”的不断优化是落脚点。课程体系是落实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基本载体,是专业群内部耦合、聚集发展的重要纽带,是专业群内部课程模块重组、知识关联的显性表示。因而,高水平专业群的提质,需不断重组升级课程模块,让课程体系优化成为提高专业群人才培养质量的基本抓手。其三,“双师建设”不断加强是保障点。教师队伍是决定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是事关专业群建设成效的重要因素。遵循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提质的行动逻辑,需建设一支专兼结合、技艺精湛的高水平“双师素质”教师队伍,以保障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成效和质量。其四,1+X证书制度的逐步落实是生长点^[5]。1+X证书制度是《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的提升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政策要求,旨在用学历教育+职业技能证书的框架制度,实现职业教育的就业与终身发展相结合的体系设计。经过近些年的实践探索,1+X证书制度已经较为清晰地显现出了对于技

术技能培养的推进意义。

(三) 牵引逻辑:从就业到发展

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的动力缘于“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规格的人才”这两个核心问题。高职教育以就业为目的,为产业提供所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由于产业持续变化和学习者需求的多方面改变,高职的就业教育定位需要回应“就业质量”和个体的可持续“就业力”培养等问题,这就是高职院校政策安排从早期主要关注“就业”问题到后来更多重视复合能力、创新能力、发展能力,从相对功利的就业导向转变为服务学生生涯发展导向的内在逻辑。比如,2006年“示范计划”主要内容中提出“针对职业岗位要求,强化就业能力培养”;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以促进就业为导向,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启动1+X证书制度,深化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施技术技能等级证书制度,反映职业活动和个人职业生涯发展所需的综合能力。在这一过程中,职业教育从一开始主要作为国家解决就业与劳动力市场供给结构性失衡的重要手段之一,逐步发展成为大国工匠培养的重要载体,政策安排中开始转变对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不仅将服务学生“生涯发展”,满足个人需求作为政策变迁的动力之一^[6],而且在“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中提出要实现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结构要素全方位融合,在打造技术技能人才高地上要求加强学生认知能力、合作能力、创新能力和职业能力培养,加强劳动教育,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培育和传承工匠精神,引导学生养成严谨专注、敬业专业、精益求精和追求卓越的品质,等等。

实际上,高职教育要满足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和人的全面发展,就必须对育人导向做出相应调整。为了促进个人生涯的终身发展,满足个体生涯发展过程中“终身学习”和“更好就业”两大目标,完成个人发展与社会需求的对立统一,类型教育下的高职教育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必须立足于“人本性”。促进个人的职业生涯发展,应从三个方面明确基本育人路径:一是服务“人的发展”,培养学生的迁移能力。

应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变革生产生活方式，重塑高职教育发展新形态，在高水平专业群建设中坚持人本性原则，服务人的全面发展，突出人的知识迁移能力的培养，满足个体对高质量职业教育的现实需求。二是落实“三教改革”，创新培养模式。随着产业迭代和升级不断加速，高职专业群建设落实“三教改革”，应以专业设置的动态调整，产教融合的不断创新，来提高高端技能人才供给的精准化。三是建立“多元评价”，确保人才培养质量。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需要把握立德树人的第一要务，将劳动教育、工匠精神融入人才培养的核心环节，构建一种将思想品德、学习能力、职业能力、创新能力、人文素养、科学精神、工匠精神等涵盖在内的立体化人才评价机制，服务个体生涯发展的全过程。

三、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改革对策

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政策理路及其内在逻辑进一步朝着引领、提质、发展等转变，不仅及时回应了职业教育内外部诉求的变化，而且成为了当前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关键抓手。但是，当前我国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在实践层面上仍存在诸多问题，如高水平专业群内涵建设亟待深化，包括组群底层逻辑不清晰，组群方式缺乏职教特色；群内专业建设资源整合效果不佳；专业群缺乏高效的组织管理保障机制等。专业群单一育人功能亟需突破，包括专业群育人模式中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中行业企业的活跃度较低；专业群人才培养的市场适应能力不高；专业群社会服务能力不足等^[7]。立足高水平专业群政策安排中的演变历程与内涵逻辑，结合实践层面的现实困境，当下和未来职业院校的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需要新的起点上高远部署、立体推进、综合施策。

（一）注重体系结构优化与相关制度的创新

政策的制定是一项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厘定政策解决的具体问题和矛盾冲突，明确政策内部体系的结构，剖析利益相关者诉求，建立制度体系的治理和保障机制是政策顶层设计科学有效的基础和前提。高水平专业群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政策过程会卷入多个利益相关方，政府发挥着主导作用的同时要关注

其他利益方的诉求。面对更为复杂的社会形式、经济形态以及技术变革，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应从体系结构优化和相关制度创新两个方面入手。在顶层设计中应将引入多元化参与主体，构建制度化的参与渠道，创新专业群建设的治理模式，建立包括政校企行等多方参与的高水平专业群建设体系作为重要内容，进而通过推动专业群建设引领职教改革不断深化。

首先，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应加快政策供给，树立“以生为本”的职业教育发展理念，搭建多元化人才质量保障机制，加强制度与非制度之间的融合，消除政策变迁的社会阻力，提高职业教育对社会的吸引力。其次，高水平专业群的政策设计应搭建多元沟通的桥梁。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政策的深层结构必需对经济形势、社会状况、产业发展、行业需求，人才供给等作出回应。这就得建立多元参与的专业群建设体系，要优先考虑多方参与沟通桥梁搭建的制度设计，保障高水平专业群建设体系的畅通。再次，应明晰高水平专业群的设计形态和治理机制。考虑到专业群的组群目前还存在标准不一、松散式捆绑等问题，不能形成专业群建设的有效治理机制等情况，在顶层设计中要明确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基本治理形式、创新治理模式。无论是选择以院建群或是以群建院的治理形式，都要注重行业企业的参与权，掌握产业发展趋势，提升职业教育引领力。最后，应明确高水平专业群的建设定位。专业群建设与经济社会等宏观层面的互动归根结底要落实到人才培养，在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制度设计中，要明确高端技术技能人才的定位，进一步彰显高水平专业群引领职教服务国家战略的类型特色。

（二）注重专业群资源整合凸显聚集效应

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是一种以高质量发展为内涵的范式改革，是以群内人、财、物为核心的建设资源的统筹及优化整合活动^[8]。从专业到专业群，传统的建设思路，在建群逻辑上，忽视了产业链的整体性，专业群内部资源建设缺乏稳定性。在资源利用上，松散的组织结构，阻碍了群内资源的流动，产生了组织壁垒，捆绑式的资源分配无法形成资源共享的聚集效应。

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应聚焦内涵发展，摒弃机械捆绑式的资源方式，根据产业迭代、技术

链条、岗位技能、知识联系、个人生涯发展等因素,对专业群建设资源进行优化重组,实现高水平专业群建设资源整合,形成集聚效应。具体来说,一是根据产业链、岗位群的新需要,加大力度改善硬件建设条件。整合专业群内的教学资源,包括实训设备、教学辅助设备、现代教育技术设备、课程实施环境建设、实训平台建设等,为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提供必要的设施支持,推动人才培养的应用性和高端性。二是搭建高水平资源共建共享平台。面对信息化、智能化的发展浪潮,高水平专业群汇聚优质的群组资源,坚持开放共享,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VR、AR 等信息技术的驱动,搭建高水平资源服务平台,提升群组内资源的利用率。此外,资源整合的目的在于发挥群内建设资源的集聚效应,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降低建设成本,保障专业群建设实施成效,这就应该面向技术革新、面向课程改革、面向个体需求,形成高质量的服务效应,实现专业群建设引领产业发展,助推传统课程组合模式改革,推动技术技能更新迭代,助力学习者生涯发展。

(三)建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专业群育人模式

在偏重社会价值取向的政策中,国家重视高职教育的经济服务功能,往往忽视高职教育的公平和学生个体生涯的发展需求。随着科技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教育实现个人价值和改变生活的需求愈发强烈。高职教育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定位和使命,在帮助学生胜任职业岗位同时,帮助学生更好地实现个人价值。高职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价值取向要依赖于群理念的价值引领。高职教育要体现“人本”与“质量”耦合的价值诉求,才能夯实人才培养质量,建立公平有序的发展格局^[9]。

高职教育的本质是促进学习者的职业发展。具体地讲,一是以制度建设为牵引,推动专业人才培养标准的制度体系构建。通过广泛的市场需求调研、企业行业参与、专业咨询等落实专业群建设的教学标准、岗位标准及人才培养标准,落实 1+X 证书制度,规范职业资格证书获取标准,提高人才培养岗位迁移和适应能力。二是以课程建设为载体,推动体现职业生涯群发展的课程模式构建^[10]。课程是人才

培养的基本载体,可以借鉴美国经验横向体现职业生涯大类、纵向体现知识技能层级的职业生涯群课程模式,助力高水平专业群课程体系建设。三是以师资队伍建设为抓手,推动高水平师资团队建设。师资队伍是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重要指征,关乎专业群集群效应的发挥成效,关乎专业群人才培养的质量。高水平专业群师资建设要引入长效机制,拓宽培育途径,鼓励科技研发,建立研修渠道等,突出师资队伍建设的实践性、技术性、多元化等特征。四是以评价机制建设为保证,推动人才培养质量评估与监测体系的构建。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增加行业企业、学习者需求的评价权重,注重专业群育人成效的评估和评价,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建立多元化人才培养质量动态监测体系,保障和提高高水平专业群育人质量。

(四)以专业群内涵建设提升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

从职业教育发展历程上看,我国职业教育算得上是“舶来品”,从清末模仿日本的实业教育、民国时期引入美国综合高中,到现代学习德国的“双元制”、英国的“现代学徒制”等等,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在借鉴国外经验中求得生存^[11]。但随着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简单的“拿来主义”不能适应高职教育的发展需求。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强调中国特色、世界水平。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高职教育在经历从引进到输出、从借鉴到创新的发展路径后,在国际竞争中优势逐渐凸显。因此,高水平专业群要不断聚集品牌和示范效应,在开放的国际竞争格局中走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12]。

类型教育之下,高水平专业群走中国特色高职道路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高水平专业群构建中国特色的内生发展路径。长期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强调对发达国家经验和理念的借鉴。面对新的世界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必须实现中国特色发展模式和理念的建构,要从注重吸收借鉴国外经验走向构建中国特色专业群内生发展道路,突破职业教育未来发展的“天花板”^[13]。二是打造国际专业建设新标准。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应

避免陷入中国特色与世界水平的封闭循环。要立足中国特色,在专业发展、课程开发、教材建设等方面建立一流高职评估尺度,形成国际一流标准。此外,“双高计划”的制度设计应加入筛选和淘汰机制,选取样本进行试点,突出“以点带面”的发展思路。三是要打造中国特色专业群品牌。建立国际交流合作长效机制,建立教师交流、学生互换、学分互认的国际合作关系,加快培养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共享产教融合教学资源,展示国际对话能力,打造中国特色专业群品牌^[14]。

参考文献

- [1][6] 潘懋元,朱乐平. 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变迁逻辑: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J]. 教育研究,2019(3):117-125.
- [2] 周光礼,吴越. 我国高校专业设置政策六十年回顾与反思——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9(5):62-75.
- [3][7] 刘晓. 高职学校高水平专业群建设: 组群逻辑与行动方略[J]. 中国高教研究,2020(6):104-108.
- [4] 张栋科. 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的行动逻辑反思与重构——基于功能结构主义的视角[J]. 教育发展研究,2019(1):17-24.
- [5] 米高磊,郭福春. “双高”背景下高职专业群建设的内涵逻辑与实践取向——以浙江金融职业学院为例[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9(6):138-144.
- [8] 孙毅颖. 高职专业群建设的基本问题解析[J]. 中国大学教学,2011(1):36-38.
- [9][10] 林克松,许丽丽. “双高”时代高职专业群建设与治理体系改革的共同演进[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0(5):134-139.
- [11] 李鹏,石伟平. 中国职业教育类型化改革的政策理想与行动路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内容分析与实施展望[J]. 高校教育管理,2020(1):106-114.
- [12] 唐春霞,谢丽琴,李昱. 区域经济发展视域下高职院校特色专业群建设逻辑与策略——基于对湖南省70所高职院校138个省级一流特色专业群建设的分析[J]. 职业技术教育,2020(33):55-60.
- [13] 李玉静. 新发展格局下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逻辑与内涵[J]. 职业技术教育,2021(1):1.
- [14] 李鹏. “双高计划”的治理逻辑、问题争论与行动路径[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0(3):126-131.

Policy Evolution, Internal Logic and Reform Countermeasur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Specialty Groups

LI Cun-yuan, CEN Jie-ling, LEI Zhi-cheng
(Zhongshan Torch Polytechnic, Zhongshan 528436,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specialty groups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leads the direction of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policy evolution of specialty group construction has gone through four periods: formation period, development period, quality improvement period and deepening peri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the spatiotemporal logic, action logic, and traction logic of specialty group construction policies show an evolutionary pattern from adaptation to guidance, from expansion to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from employment to development. Facing the new development situation and demands, specialty group construction policies in China should insist on focusing on system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related system innovation, focusing on the integration of specialty group resources, highlighting the aggregation effect, establishing a “learner-centered” education model for specialty groups, and utilizing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of specialty groups. And it should implement reform strategies such as enhancing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with the connotation of specialty groups should, and unswervingly follow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pecialty group constructio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policy